

津沽学人

与时代同进步 以道德传薪火

——温克勤先生的伦理学之路

温克勤先生是天津社会科学院令人景仰的前辈学者，也是新中国伦理学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学科奠基者之一。从新中国成立前的艰苦求学，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学学习；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习哲学、参加工作，到改革开放后投身伦理学研究和学科建设，温克勤先生紧跟时代步伐、走向学术研究、推进学术创新的人生历程，绽放了学术生命的绚丽之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他将自己的学术生涯与中国伦理学学科建构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推进中国伦理学发展贡献了自己的独特力量。

人生选择与思想底色

1936年农历八月十五，温克勤出生于海河下游葛沽镇的一户平民家庭。7岁那年，父亲病逝，此后母亲靠帮人纳鞋底、洗衣服、做保姆养家糊口，拉扯三个孩子长大。1945年春，他进入葛沽私立小学学习，一年后因交不起学杂费而短暂辍学，之后转入带慈善性质的半私塾性的自静堂小学，后又转入正规小学。新中国成立后，新社会新气象，让温克勤感受到人生道路的光明前景，他心里非常高兴，积极参加游行等各种庆祝活动。“我的童年将要结束的时候，迎来了幸福的曙光。”温克勤后来回忆道。

1950年春，温克勤考入葛沽中学，不仅勤奋学习知识，还积极学习革命道理，追求思想进步。1951年4月，他在葛沽中学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3年9月考入塘沽中学上高中，高中阶段的政治课、历史课学习，让他对党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亲身经历的新旧社会的鲜明对比，更加坚定了他追求进步跟党走的人生信念。高二时，他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于1956年3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高中毕业后，组织上推荐温克勤报考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学机械，然而他对理工科兴趣不大，唯独对政治理论课产生浓厚兴趣。1957年5月，温克勤从北京工业学院退学，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在人大，他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外哲学史，系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后来从事理论工作、开展哲学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大学后期，温克勤对伦理学产生浓厚兴趣。有一天，他在王府井逛旧书店，见到温公颐先生的《道德学》，觉得内容充实、说理明白，非常喜欢，便用一个月仅有的一元零花钱买下来，一边认真研读，一边在书上写批语。多年后，他调入南开大学哲学系，系主任正是温公颐。得知温克勤曾读过自己的《道德学》，温公颐先生颇为高兴，希望他将此书赠给自己。温克勤欣然将这本《道德学》赠给了作者本人。

1962年大学毕业后，温克勤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今首都师范大学）政教系任教。此后十多年间曾被借调到教育部高教司等多个部门工作。1976年调到天津市委宣传部《学习通讯》杂志社工作。1979年调入南开大学哲学系。时值改革开放之初，哲学社会科学迎来繁荣发展的春天，伦理学开启了恢复学科建制、建构学科体系的新历程。出于对这一学科的爱好和提升社会道德的使命感，温克勤将研究方向聚焦到伦理学上，走上了伦理学教学研究的道路。1982年，他调入天津社会科学院，后历任哲学所、伦理学所所长，为伦理学领域的学术研究、期刊建设倾注心力，筑就了属于自己的学术高峰。

学术贡献与思想主张

1980年6月，中国伦理学会成立暨第一次全国伦理学研讨会在无锡召开，温克勤提交了论文《研究我国古代的伦理学遗产》，受到与会学者重视。这次会议对他的学术人生产生了深刻影响，他后来回忆道：“中国伦理学会的成立，使我从一个伦理学爱好者变成一个伦理学工作者。”1982年7月，他参加中国伦理学会在北京密云召开的座谈会，张岱年先生作了《中国伦理学史的研究方法》专题报告。这次会议使温克勤萌生了编写一部中国伦理学思想的念头，为此，他与陈瑛、唐凯麟、徐少锦、刘启林等学者合作，出版了《中国伦理思想史》一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该领域较早的系统性著作之一。此后，他一直从事中国伦理思想通史的研究工作，退休

津沽学人 | 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合办
天津日报

津门学问大家陈邦怀先生，研究领域颇广，涉及古文字学、金石学、古文献学、诗词歌赋及书法等，是著名古文字学家、甲骨学家、青铜器专家、历史学家。

陈邦怀（1897—1986），字保之，祖籍江苏镇江，出身书香门第，幼承家学，勤奋刻苦，博览群书，打下了坚实广博的学术基础。1916年至1931年，他先后在东台、南通、无锡等地执教，还曾担任过实业家张謇的秘书。1931年，陈邦怀北上津津，任职于中国银行。1954年受聘为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后任副馆长。1979年任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顾问，1983年当选中国书法家协会天津分会首任主席。

陈邦怀的家乡镇江丹徒，是甲骨文学者群出之地，刘鹗、叶玉森、鲍鼎等都是丹徒人。有此得天独厚的条件，陈邦怀青年时代就开始甲骨文字的学习，还有幸得到“甲骨四堂”之一、著名学者王国维的肯定和提携，这对他影响巨大。早年陈邦怀与《续殷礼征文》，就是为补充王国维的名文《殷礼征文》。

《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王国维书信日记》收录5封陈邦怀致王国维请教信，王每封必回，往来共计10封信。这些珍贵资料，记录了陈向王请教甲骨学研究的相关问题、向其借阅相关书籍，王为陈买书、寄书、赠书，让陈深受感动等往事。

从二人频繁的鱼雁往还之中，可窥见甲骨学大师对年轻学子的提携与厚爱，王的热诚与平易，展现了一位深情的传统知识分子形象；同时也从中了解年轻的陈邦怀学习甲骨文的

《殷代社会史料征存》书影

关欣 李会富



温克勤先生的主要著作

之后仍笔耕不辍。2013年，他还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伦理思想简史》一书，系统阐述自先秦至近代的中国伦理思想演变历程。

在编纂通史的同时，温克勤围绕中国传统伦理的核心命题展开持续的专题研究。他系统梳理了先秦儒家的思想资源，指出崇仁重义、尚礼贵诚、重智尚勇、贵和执中、自强厚德、爱国奉献等思想精粹，在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将儒家伦理从“封建意识形态”的单一标签下解放出来，还原其作为民族文化精神资源的历史地位。他对长期存在的“逢儒必反”的思维定式保持警觉，主张辨析儒家伦理的合理成分与历史局限，不能因为批判封建主义就将全部传统道德一概抛弃。他既深入研究康德伦理学，撰写了研究康德批判幸福论伦理学的论文，也深入研究儒家的义利之辨，在中西伦理比较方面进行深入思考。在改革开放之初，伦理学领域旧的框架已被打破，新的范式尚未建立，研究传统伦理仍然是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领域。温克勤的做法是回到文本和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中国传统伦理的本来面目，这种审慎而理性的态度，恰恰是当时学科重建最需要的东西。

在伦理学的研究过程中，温克勤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他批评“人性是道德的根源和基础”的观点，认为这种看法“重复了历史上人性道德观的错误”，违背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他批判道德相对主义，指出其“割裂特殊与普遍、相对与绝对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实践上会导致“道德信仰、道德权威的危机”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流行。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争论中，他旗帜鲜明地坚持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他认为，应将集体主义原则本身与贯彻实施中出现的偏差区别开来，集体主义不仅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对立，而且有了它的导引，市场经济才能健康发展。为此，他撰写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集体主义道德》一文，该文荣获第三届（1993年度）“五个一工程”奖。

温克勤高度重视伦理学的实践价值，密切关注现实社会的道德建设。他认为，伦理学不能只停留在书斋和课堂上，更应该从学术殿堂走向社会大众，发挥其改造和提升人的精神世界的实践功能。为此，他牵头主编了《干部道德教程》《家庭伦理道德读本》以及“中华五千年美德丛书”“公民道德教育丛书”等大量普及读本，其中“中华五千年美德丛书”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这些学术成果紧扣当时公民道德建设的需要，为提升社会文明素养发挥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学会建设与办刊育人

中国伦理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我国的正式恢复，也为后续学术平台的建设奠定了组织基础。温克勤从学会成立之初即积极参与其中，从第一届理事大会成立起一直担任理事，历时二十余年。他还参与筹备建立了天津市伦理学会，先任副会长兼秘书长，1985年起任会长直至2004年底，为伦理学的学术组织建设做了大量工作。由于在伦理学研究和学会建设方面作出突出贡献，2010年，他被中国伦理学会授予终身成就奖。

在温克勤先生推进伦理学学会建设和学科发展的工作

中，创办《道德与文明》期刊是一个影响长远的重要举措。改革开放初期，社会道德生活领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加强道德建设和伦理学研究成为全社会共识，这急需一个围绕伦理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交流研讨的学术阵地。在此背景下，1980年8月，尚在南开大学任教的温克勤先生与天津社科院哲学所曹瑞亭老师，以天津社科院哲学所为依托，创办了一份油印《伦理学简报》，印发给天津市伦理学会筹备组成员和中国伦理学会理事。1981年6月后，简报发放范围扩大为天津市伦理学会会员和中国伦理学会会员，并明确这份简报由天津社科院哲学所与中国伦理学会秘书组联名合办。这份简报初步搭建了一个服务全国伦理学界的学术交流报刊平台，受到广泛欢迎。

1981年11月，在安徽屯溪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伦理学会研讨会上，中国伦理学会决定创办伦理学专业学术期刊。鉴于已有的合作基础，中国伦理学会决定与天津社科院合作办刊。1982年8月，温克勤调入天津社科院，专门负责该刊的编辑出版工作。刊物最初命名为《伦理学与精神文明》，为内部发行期刊，1982年10月出版试刊号，1984年转为公开发行，1985年更名为《道德与文明》。这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一家伦理学专业期刊，也是当时全国伦理学界唯一的学术刊物。刊物创办后，李奇、罗国杰、陈瑛等著名学者先后担任主编，温克勤先是担任常务副主编，后又担任主编，并一直主持编辑部工作，直至1996年退休。为了办好这个刊物，他十多年奔走于京津之间，组稿、看稿、送审、出版印刷、筹措经费，可谓悉心经营、殚精竭虑。在经费紧张时期，为节省差旅费，他每次到北京办事或开会都尽可能当天赶回天津，不在旅馆住宿。如实在赶不回来，他就在北京站旅客休息厅小睡几个小时，次日赶早车回津。在全国伦理学界支持下，经过以温克勤等人为代表的办刊团队的辛勤付出，《道德与文明》在全国学术界的影响越来越大，成为全国伦理学界推动学科建设、培育学术新人、促进学理创新的重要阵地。

回望温克勤先生的学术人生，他在旧社会经历了贫寒与苦难，在新中国得到培养和成长，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实现了自己的学术理想，在伦理学的多个领域留下了开拓性的成果。这些成果至今仍惠及学界，值得我们深入研究、认真学习，也鼓舞我们以更大勇气推进学术创新，以更好业绩奉献给时代和人民。

（作者李会富系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关欣系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撰写得到温克勤先生哲嗣温宇宁先生大力帮助，特此致谢。）

学人小传

温克勤（1936—2022），天津葛沽人，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先后在北京师范学院、天津市委宣传部、南开大学、天津社科院工作。曾任天津社科院社会学伦理学美学研究所副所长，哲学所、伦理学所所长，《道德与文明》常务副主编、主编，曾兼任中国伦理学会理事、常务理事，天津市伦理学会会长等。出版著作十多部，发表论文二百余篇。两项成果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四项成果获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被中国伦理学会授予终身成就奖。

津派文化大家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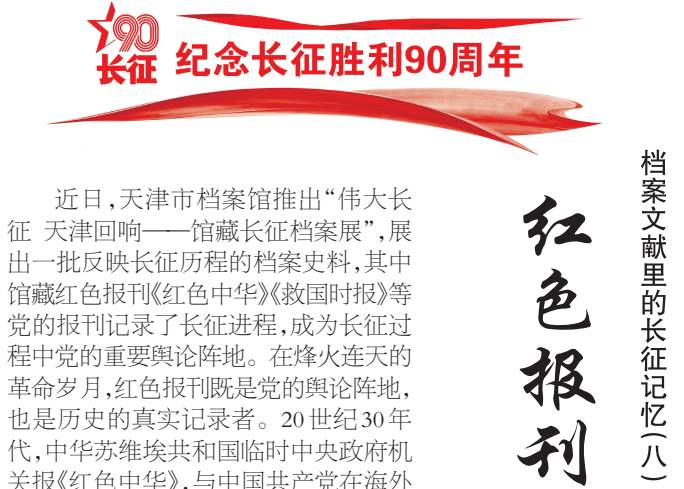
甲骨文考释著作。全书考释字、词43个，大多是发择前人之说，再简述自己的见解。他在考释甲骨文字时，往往结合古代文献已载和考古出土文物，乃至与后世的金文、篆籀等结合，使得一字之解，在古今文字中皆能得其通畅无碍，因此陈先生的考字，多有精彩不移之处。比如其中的“藉”“典”“役”等字都是非常可取的。

《甲骨文字零拾》（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是陈先生十余年间于京津两市所搜集的珍贵甲骨精品的著录，大都零星得之，故名“零拾”。前有拓本图版，后有文字考释，共著录甲骨图版160片。该书的文字考释，有的遵从前人说法，也有不少属于自己的全新解读。比如陈先生对甲骨文记事刻辞中“示”字的考证，意为检视、验收，颇见功力，而今已为学界所普遍信从。

《殷代社会史料征存》（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是陈先生充分利用殷墟甲骨文材料复原研究殷商社会历史的代表作。该书正文分为两卷：卷一，包括四方风名、冒母星、殷之军制、殷之马政、殷之官室等5节；卷二，细分为舞雨、宁风等66条，共对71条甲骨卜辞所表现出来的商代史料进行解读，参考古籍以考证殷代社会的状况及制度，或从他人之说而加以发挥，或驳他人之说而提出见解，均足以立论成说。日本著名甲骨学家松丸道雄撰文《陈邦怀编著“甲骨文字零拾附考释”、陈邦怀著“殷代社会史料征存”》（《日本《甲骨学》第九号》），对两书给予高度评价。

除了以上几种甲骨学著作之外，陈邦怀先生还有不少甲骨学研究的散篇论文发表，也都有拓本图版，后有文字考释，共著录甲骨图版160片。该书的文字考释，有的遵从前人说法，也有不少属于自己的全新解读。比如陈先生对甲骨文记事刻辞中“示”字的考证，意为检视、验收，颇见功力，而今已为学界所普遍信从。

《殷代社会史料征存》（1927年版，线装一册）是陈先生



近日，天津市档案馆推出“伟大长征 天津回响——馆藏长征档案展”，展出一批反映长征历程的档案史料，其中馆藏红色报刊《红色中华》《救国时报》等党的报刊记录了长征进程，成为长征过程中党的重要舆论阵地。在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红色报刊既是党的舆论阵地，也是历史的真实记录者。20世纪30年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与中国共产党在海外创办的抗日宣传阵地《救国时报》，以笔墨为刀，以纸页为媒，一内一外共同镌刻下长征的深刻印记。这些历经战火留存下来的报刊史料，既是研究红军长征史的核心文献，也是传承长征精神、赓续红色血脉的珍贵载体。

《红色中华》1931年12月11日创刊于中央苏区，是党在革命根据地的核心舆论阵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该报一度停刊；1935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该报在瓦窑堡复刊。从长征前夕的秘密动员，到战略转移后的路线转向，再到胜利会师的历史时刻，《红色中华》记录了长征的关键进程。

第五次反“围剿”后期，中央革命根据地形势日趋严峻，战略转移迫在眉睫。《红色中华》以公开宣传为掩护，悄然完成了长征的物质筹措与思想准备。

1934年9月8日，《红色中华》刊发《募集廿万双草鞋慰劳红军》一文，以“不要使一个红色战士赤足作战”为号召，以筹备“十万革命节礼物”为公开名义，将20万双草鞋的募集任务量化分解至各县。10月10日，也就是中央红军主力踏上长征路的当天，募集工作如期完成，以慰劳之名隐秘保障了战略转移的军需物资需求。9月29日，张闻天在《红色中华》发表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系统阐释国内战争发展规律，明确提出“暂时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保持红军主力的有生力量”的核心论断，向根据地干部群众传递“转移不是失败，而是为了争取更大胜利”的信念，为战略转移统一了思想、稳定了人心。

10月3日，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联合在《红色中华》上发布《为发展群众的游击战争告全苏区民众》，这是长征前夕面向全苏区民众的公开宣言。文章直面严峻局势，号召群众在主力红军转移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扰乱、牵制敌军，配合主力作战，为苏区后续斗争指明了方向，也深刻印证了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根本工作路线。

红军落脚陕北后，复刊的《红色中华》真实记录了革命事业的战略转向与长征胜利的伟大时刻。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1936年1月3日，《红色中华》刊发《全苏区红军举行壮烈的抗日宣誓》一文，文中称，1936年1月1日当天，全苏区红军为表示热烈的誓死抗日决心，集体举行了抗日宣誓，号召掀起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为红军东征、奔赴抗日前线做好舆论动员。

1936年8月30日，《红色中华》刊发消息《准备迎接全国主力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的空前大会师》，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前夕发出动员号召。10月9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10月22日，红一、红二方面军在宁夏将台堡会师，至此，红军三大主力完成会师，历时两年的长征胜利结束。《红色中华》连续推出《庆祝全国主力红军大会合》《我一方面与四方面军会合了！》等报道，以最快速度向苏区军民传递会师喜讯，见证了红军长征的辉煌胜利。

《救国时报》于1935年12月9日在法国巴黎创刊，是中国共产党在海外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的机关报，也是冲破国民党新闻封锁、向世界讲述中国革命的重要窗口。这份报纸通过连载长征亲历者的长篇回忆文章，系统还原长征的真实面貌，让长征精神在海内外广泛传播。该报通过海外邮寄的方式传入国内，再经地下交通线传入天津等地，在进步群体中秘密传阅，极大鼓舞了地方党组织的革命斗志。

1936年12月至1937年6月，《救国时报》连载长征亲历者邓发（笔名“杨定华”，长征期间任中央纵队第一梯队司令员兼政委）的长篇纪实作品《雪山草地记录了红军翻越太金山、梦笔山等座海拔4000米以上雪山，穿越松潘草地的极端考验：高寒缺氧、风雪交加的环境里，战士们缺衣少食，以野菜、皮带充饥；黑水、芦花筹粮阶段，“上自朱德总司令，下至炊事员、饲养员，都一齐动手，参加割麦的运动”，朱德不仅和战士一同割麦打麦，还往返二十里山路挑五六十斤麦子，一句“你们这些青年人挑不到四五十斤，唉！什么青年？”的玩笑，生动刻画出红军将领与士兵同甘共苦的革命本色。

1937年7月至1938年1月，邓发的另一部长篇亲历记《由甘肃到山西》在《救国时报》连载。文章记述了红军突破腊子口、落脚陕北、挥师东征的全过程，明确阐释：长征并非单纯的战略转移，而是北上抗日的战略进军。这一论述清晰地打通了长征与抗日救国的内在逻辑，向海内外系统宣示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主张。文中还记载了红军行军中的新困难：“这次宿营，不但无房子住，而且没有水喝。过去夜行军，露宿和吃不到晚饭是曾经有过的，但连冷水都找不着喝这却是第一遭。”进入甘肃黄土高原后，红军宿营时既无房住，也缺水喝，但即便干渴难耐，也绝不擅动百姓赖以生存的窖水，而是远赴山沟取用浑浊的涝坝水。当地百姓目睹这支爱护群众的队伍，深受感动，纷纷主动送水给红军，体现了人民群众对红军的支持和信任，彰显了人民军队军民一致的建军原则。

事实上，《救国时报》创刊号便已吹响团结抗日的号角。1935年12月9日，该报发表社论《中华民族一致对外》，提出“停止内战、中华民族一致对外”的政治主张，号召“不分信仰，不分派别，团结抗日，一致救国”。这一主张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重要舆论先导。

一张张泛黄的报刊纸页，是长征历史的“活化石”。《红色中华》与《救国时报》，一内一外、彼此呼应，以文字记录征程，以舆论凝聚力量，共同构筑了关于长征的红色记忆。

题图：1936年10月15日刊登有《庆祝全国主力红军大会合》消息的《红色中华》版面。



第五四九七期

档案文献里的长征记忆（八）

红色报刊记下难忘岁月

岳长亮

